

〔英〕约翰·马歇儿 著  
王 冀 青 译

# 犍陀罗佛教艺术

甘肃教育出版社



# 犍陀罗佛教艺术

〔英〕约翰·马歇儿 著

王 冀 青 译

甘肃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明珏

## 糖陀罗佛教艺术

[英]约翰·马歇儿 著

王冀青 译

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81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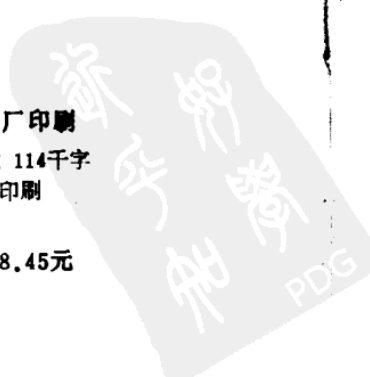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平凉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4.2 字数 114千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

ISBN 7-5423-0123-3/J·3 定价：8.45元



# 约翰·休伯特·马歇儿 与英属印度美术考古学

王 冀 青

## 一

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艺术史家约翰·休伯特·马歇儿爵士（Sir John Hubert Marshall）的名著《犍陀罗佛教艺术》（The Buddhist Art of Gandhara）已问世29年了。29年来，马歇儿的研究成果已被欧州、北美、日本的学者广泛引用于印度学、中亚学、敦煌吐鲁番学、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等研究领域。今天，我们又有机会将这一成果介绍到中国来，这无疑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值此之际，我们有必要对作者的生平与历史背景以及《犍陀罗佛教艺术》一书所涉及的一些问题作一介绍，算做是这部著作的中译本序言吧。

首先，我们应该用最通俗简单的语言介绍一下什么是犍陀罗佛教艺术。

犍陀罗佛教艺术，既是一种艺术流派，又代表一种艺术风格。它发祥于印度半岛西北部（今巴基斯坦北部），而这片地区古名犍陀罗，所以后世的考古学家们将该地区出土艺术品所呈现的一种特殊风格或所代表的一种特殊流派定名为犍陀罗佛教艺术。

犍陀罗佛教艺术最基本的特征是：采用古希腊、罗马的艺术

技巧和艺术形式以宣传印度佛教思想内容。艺术史家们偶或将犍陀罗佛教艺术称为希腊式佛教艺术，便是企图反映这一基本特征。应该提一句，迄今为止，在犍陀罗地区还从未发现过绘画作品，更没有发现过古希腊罗马式的佛教绘画作品，所发现的艺术品都是雕刻作品。因此，犍陀罗艺术风格只适用于雕塑作品，今天我国的某些学术论著在探讨绘画作品时大谈犍陀罗风格，这是不适宜的。

犍陀罗佛教艺术是印度佛教文化与希腊及地中海古典文化碰撞、融汇、结合的产物。而这两种文化是因公元前4世纪在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大帝远征印度的推动下才相互激荡、碰撞的，最后融合在犍陀罗地区。我们可以说，就犍陀罗佛教艺术的产生而言，印度佛教文化是其母体，希腊及地中海文化是其父体，而位于印度半岛西北部的犍陀罗地区则是孕育它的“子宫。”因此，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形成与产生过程，体现了南欧、西亚、南亚文明在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西半段上的交流。

所有的文化生长到一定程度，必定要发展并突破旧有的躯壳，向外部扩散并与其它文化发生接触。犍陀罗佛教艺术也不例外，它一旦成熟，便不情愿局限于南亚一隅了。随着佛教向北、向东的传播，犍陀罗佛教艺术也漫游于中亚、东亚地区。虽说“入乡随俗”，它的外貌随时随地有些变化，但其基本特征与基本精神仍在，我们今天可从阿富汗、苏联、中国、朝鲜、日本的佛寺、石窟雕塑作品中明显地看出犍陀罗佛教艺术风格的神韵，而中国新疆和阗、库车、米兰、吐鲁番、甘肃敦煌、炳灵寺、麦积山、河南龙门、山西云冈等处呈犍陀罗教艺术风格的雕塑作品是当今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重要对象。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外传过程，又体现着南欧、西亚、南亚、中亚、东亚文明在丝绸之路东半段上的交流。

可以说，犍陀罗佛教艺术像一条金色的纽带，将地中海和太

平洋之间的欧亚大陆诸文明联系到了一起。虽然古希腊罗马文化借此间接传播到中国、日本要经历数百年的漫长岁月，但这更能证明一条真理：人类各民族文化之间直接或间接的交流与影响是能够超越空间与时间限制的。

毋庸置疑，犍陀罗佛教雕刻艺术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但是对它的确认只是在一百多年前才完成的。道理很简单：印度西北部在公元5世纪下半叶遭到不信佛法的吠哒人（Hephthalites）的大举侵略，犍陀罗本土的佛教寺庙被全部焚毁，而劫后残存的佛教石雕又因各种原因被埋葬在地下，一直到了英国统治印度时期，随着当时印度学与美术考古学的不断发展，这批艺术珍品才重见天日。

## 二

下面我们谈一谈马歇儿之前英属印度的印度学与美术考古学。

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开始对印度及远东进行殖民侵略，此后二百年间，英国的势力在印度半岛上不断扩大。英国为了巩固在印度的殖民统治，需要了解被占土地上的人民及其历史文化，于是印度学作为早期东方学的一个分支相应而生（早期东方学明显带有为殖民政服务政策的倾向，其他分支如中国学、埃及学等亦是如此）。

印度学的基础内容是语言学和美术考古学，其创始人是被西方学者与印度学者交口赞颂的“东方学之父”、“第一个伟大的梵语学家”、“印欧语系奠基人”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 1746—1794年）。1784年1月15日，琼斯在英属印度首府加尔各答创建“孟加拉亚细亚学会”，其宗旨是研究“亚洲的历史文物、艺术、科学和文学”，其成员都是英国在印

度的军事人员和行政人员，他们利用职务的方便，在印度各地搜寻调查文物古迹，做为唯一的业余爱好。可以说，孟加拉亚细亚学会的创立，是英属印度的印度学与美术考古学的正式发端。此后大约六十年间，该会会员们解读了笈多文，发现了山奇大宰堵波、阿旃陀石窟、阿玛拉瓦提大宰堵波、犍陀罗佛教雕刻等，收获甚大。1834至1837年间，加尔各答造币厂化验师詹姆斯·普林塞普（James Prinsep, 1799—1840年）成功地解读了佉卢文与婆罗谜文，为后来敦煌、中亚发现的古文书研究奠定了基础。普林塞普壮年而歿后，印度学学界立即处于停滞与混乱的状态。

1818年，驻印英国皇家士兵中尉亚历山大·坎宁汉（Alexander Cunningham, 1814—1893年）著文敦促英印政府委派一名具有印度艺术、宗教知识的官员负责印度文物与艺术品的调查与保护工作，以结束官方不过问考古的状态，但他的提议未被理睬。

1858年东印度公司解散，印度改受英国政府直接管辖。1860年，由英国政府任命的第一位印度总督坎宁勋爵（Lord Canning）决定组建北印度考古部，其首领称考古总监。这时以少将衔退休的坎宁汉被任命为第一任考古总监，其薪水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450卢比，另一部分是他发现的文物与艺术品的一部分。

1866年2月9日，印度第五任总督劳伦斯勋爵（Lord Lawrence）废除考古总监一职，坎宁汉被迫返回英国。在学界内外一片抗议声中，第六任总督梅约勋爵（Lord Mayo）同意在印度政府之下，重新建立一个特殊的直属部门——印度考古局，这是今天仍存在的巴基斯坦考古局与印度考古局的前身。1870年，坎宁汉被召回印度，担任印度考古局第一任局长，一直到1885年10月1日。在这15年间，坎宁汉的主要工作是拿着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英译本按图索骥，在草莽丛林之中发现了许多

佛教美术遗址。

1885年坎宁汉临离职前，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建议印度的考古工作应该下放到各省各邦地方政府，而不必有一个像印度考古局这样的中央机构，局长一职应该取消。所以1885年之后，印度的美术考古工作又进入了一个混乱无秩序的萧条年月，一直到1902年约翰·休伯特·马歇儿担当第二任印度考古局局长时为止。

### 三

犍陀罗佛教艺术品被重新发现，是19世纪上半叶的事情。当时，印度半岛西北部还处于半独立状态，一些英国军政人员如马松（C. Masson）、梵图拉（Ventura）、考特（Court）、高特利（P. T. Cautley）等从印度西北边境的喀布尔河流域带回许多呈希腊风格的佛教艺术品，引起人们的注意。1849年，旁遮普和犍陀罗故地被英国完全占领，业余文物爱好者们开始在更大范围内搜求犍陀罗佛教艺术品。1860年北印度考古部成立后到1885年坎宁汉辞去印度考古局局长这25年间内，英印政府以官方的身份也加入犍陀罗雕刻的搜求活动。其结果，是大量犍陀罗佛教艺术品流入印度和欧洲，其中较著名的收藏单位是印度加尔各答博物馆、拉合尔博物馆、孟买维克多利亞和阿尔伯特博物馆、英国博物院、爱丁堡大学、德国柏林人种学博物馆、法国卢佛宫、奥地利维也纳博物馆等。但同时由于管理不善和掠夺式发掘，使许多犍陀罗艺术珍品得而复失，重遭毁坏，如克利夫·白利爵士（Sir E. Clive Bayley）在迦玛尔一嘎利（Jamal-Garhi）遗址购得的犍陀罗艺术品于1866年11月毁于加尔各答水晶宫展厅大火，再如，1885年11月坎宁汉离职返英时，将托运的一大批犍陀罗艺术品倾覆在斯里兰卡附近的海域中。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和欧洲的学者们开始对犍陀罗佛教艺术品进行理论研究。英国最早的研究者是拉合尔博物馆馆长洛克伍德·吉卜林（Lockwood Kipling, 1837—1911年），他所主持的博物馆是收藏犍陀罗雕刻品数量最多的博物馆，他的儿子、英国著名作家、190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鲁得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年）在其获奖作品《吉姆》（Kim）开端曾这样回忆拉合尔博物馆：“（这里收藏着）希腊式佛教艺术的杰作，……数百件残片，包括浮雕人物中楣、雕像残片和用于镶嵌印度北方佛教率堵波和毗诃罗砖墙的雕刻石板，现在它们被挖了出来，贴上标签，成为这个博物馆的骄傲”。1899年，旁遮普大学学生注册官兼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奥莱尔·斯坦因（M. Aurel Stein, 1862—1943年）曾在吉卜林指导下潜心研究拉合尔博物馆藏的犍陀罗佛教艺术品，他利用所得到的知识于1900年后在中国新疆和阗、米兰、焉耆等地劫走大量呈犍陀罗艺术风格的佛教雕塑品。

从1883年起，德国东方学家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 1856—1935年）研究柏林人种学博物馆收藏的63件犍陀罗佛教艺术珍品，他于1893年在柏林出版了《印度佛教美术》（*Buddhistische Kunst in India*）一书，这是世界上第一部主要研究犍陀罗佛教艺术的专著，轰动了整个国际东方学界。

1896年，法国东方学家阿尔弗莱·福色尔（Alfred C. A. Foucher）在朋友斯坦因陪同下考察研究印度西北部的犍陀罗佛教艺术品，他的研究成果是于1905至1923年在巴黎陆续出齐的《犍陀罗希腊式佛教美术》三卷本（*L'Art gréco-bouddhique du Gandhara. 3 vols*），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研究犍陀罗佛教艺术的专著。

格伦威德尔的《印度佛教美术》、福色尔的《犍陀罗希腊式佛

教美术》和马歇儿的《犍陀罗佛教艺术》是世界上公认的三部犍陀罗艺术研究权威性著作。但是前两部著作存在着共同的缺陷：其一，作者都不是英国人，对英属印度艺术缺乏感性认识；其二，两部著作所依据的资料都是19世纪零星发掘出来的作品，时间早，年代不明，且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明显；其三，由于上述两点局限，两位作者的研究角度是繁琐的造像学，而未能从考古学、美学等角度予以深入研究。这些缺陷在1960年出版的《犍陀罗佛教艺术》中都得到了弥补，马歇儿依据20世纪上半叶由他亲自进行的犍陀罗佛教艺术遗址的发掘所获资料，总结格伦威德尔和福色尔已取得的成果，从年代学、考古学、美学等角度重新研究犍陀罗佛教艺术，本书的深度与价值远远超过前两部著作，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因此，1902年马歇儿赴印度就任印度考古局局长一事，不仅标志着英属印度美术考古学的重新崛起，也标志着犍陀罗佛教艺术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 四

约翰·休伯特·马歇儿于1876年3月19日出生在英国柴郡切斯特（Chester, Cheshire），他早年接受古典学（古希腊罗马研究）教育，曾任希腊雅典不列颠学院实习生。当英国著名考古学家亚瑟·伊万斯爵士（Sir Arthur Evans）发掘希腊克里特岛诺索斯的米诺斯宫殿遗址时，马歇儿曾协助他工作过一段时间。此后，马歇儿还在土耳其南部和巴尔干半岛南部从事过很多考古工作。

1899年，寇松勋爵（Lord Curzon of Kedleston, 1859—1925年）被任命为印度总督，这位寇松以前曾多次考察中亚地区，对东方学和中亚学有所研究，曾著有《俄国在中亚细亚》

(1889年)、《远东问题》(1894年)、《葱岭与乌浒水之源》(1899年)等名篇。他上任后认为极有必要恢复印度政府直接领导的美术考古工作,于1900年12月提议取消地方政府组织考古的权力,恢复印度考古局的实际职能。1901年,印度议会同意恢复印度考古局局长一职,其职责是组织并监督整个英属印度的考古工作,包括发掘、保护、修复、研究等环节,而担任这一重要职务的人必须是一位学者兼专家。同时印度政府要求英国国内机构推荐人选。

1902年,伦敦的英国博物院推荐26岁的马歇儿出任印度考古局局长,他任这一职务长达26年,直到1928年为了集中时间撰写著作,才辞去该职。在马歇儿任职期间,英属印度的美术考古学达到了极盛阶段。英国和南亚学者一般认为:在印度考古学史上,琼斯是18世纪的代表人物,坎宁汉是19世纪的代表人物,而马歇儿是20世纪的代表人物。

马歇儿上任后,在行政管理方面采取了如下几点措施:

1、将全部英属印度分为六个大区:孟买、信德和贝拉尔大区;马德拉斯和库尔格大区;旁遮普、卑路支斯坦和阿基梅尔大区;西北诸省和中央诸省大区;孟加拉和阿萨姆大区;缅甸大区,每一大区设考古监督官一人,另在考古局设“政府碑铭解读官”一人。马歇儿任命的下属都是著名的学者,如他在1904年任命英属印度最有名的田野考古学家斯坦因为旁遮普、卑路支斯坦和阿基梅尔大区考古监督官,1906年任命最优秀的中亚法卢文研究专家斯坦·阔瑙(Dr. Sten Konow)为政府碑铭解读官。

2、兴建博物馆和图书馆。马歇儿建立的博物馆主要有:阿格拉博物馆、新德里博物馆、德里堡博物馆、拉合尔堡博物馆、曼达莱博物馆,但叉始罗遗址博物馆、摩亨佐达罗遗址博物馆、哈拉帕遗址博物馆等。此外,他在考古局内设立中央考古图书馆。

### 3、建立奖学金制度，培训印度青年学习考古。

除了上述行政管理之外，马歇尔亲自主持了印度河流域三大遗址的发掘工作。

#### 1、哈拉帕遗址。

哈拉帕遗址位于今巴基斯坦的蒙哥马利，1852至1853年坎宁汉曾到过这里，但未加以注意。1922年，马歇尔主持该遗址的发掘。具体工作由印度籍考古学家达雅·拉姆·萨赫尼(Daya Ram Sahni)进行。

#### 2、摩亨佐达罗遗址。

摩亨佐达罗遗址位于今巴基斯坦的拉尔卡纳附近，1922年马歇尔亲自进行发掘工作，一直到1927年。

#### 3、坦叉始罗遗址。

该遗址是马歇尔的犍陀罗佛教艺术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我们将在下节详述。

马歇尔在哈拉帕遗址和摩亨佐达罗遗址的考古结果，将印度历史至少提早了二千多年，使整个印度学为之改观。

为了集中精力发掘摩亨佐达罗遗址和坦叉始罗遗址并撰写考古报告，马歇尔于1928年9月6日辞去印度考古局局长一职。按规定，他应于1931年3月19日退休，但由于在坦叉始罗遗址的发掘工作未完，他一直拖到1934年3月15日才宣布退休，这一天，他最终离开生活了32年的印度，返回英国。1958年8月17日，马歇尔在英国病逝，终年82岁。

马歇尔还曾兼任英国剑桥大学王家学院名誉研究员、法兰西研究院通讯院士，1914年被英国封为爵士。

除了坦叉始罗遗址考古报告和犍陀罗佛教艺术研究论著之外，马歇尔的主要论著有：《保护手册》(Conservation

Manual, Calcutta, 1923)、《摩亨佐达罗与印度河文明》(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 3 vols,

London, 1931)、《山奇的纪念塔》(Monument of Sanchi, 2 vols, Delhi, 1940)等。

## 五

最后，我们重点谈谈马歇儿在犍陀罗故地坦叉始罗遗址的发掘和对犍陀罗佛教艺术的研究。

坦叉始罗(Taxila, 现代一般译为塔克西拉)是英属印度西北部(今巴基斯坦北部)的一个古老小城,位于印度河与杰卢姆河之间、慕雷丘陵脚下、拉瓦尔品第西北20英里处。这里曾是古代犍陀罗国的两大政治、文化中心之一(另一中心是布路沙布罗即今巴基斯坦之白沙瓦),它的地下埋藏着大量的犍陀罗佛教艺术品。

在19世纪,坎宁汉发现了坦叉始罗的佛教遗址,1900年1月10日,斯坦因也曾考察过这些遗址,但他们都未曾进行过发掘工作。

1902年,马歇儿上任伊始,便视察了坦叉始罗,当他看到半埋在地下的城市遗址时,非常激动,立即向印度政府打报告,要求发掘。但是不久,坦叉始罗所属的拉瓦尔品第地区专员也上书印度政府,认为坦叉始罗靠近边境,且当地民心不稳,在这里挖掘古遗址很可能引起麻烦,印度政府赞同专员的意见,马歇儿只好耐心等待,一等便是10年。

1913年春天,马歇儿开始了在坦叉始罗的发掘工作,此后,每年春季和秋季(其它季节不适于发掘)都坚持发掘,一直持续到1934年他离开印度时为止,也就是说,马歇儿在坦叉始罗遗址一共发掘了21个年头,这在考古学史上是罕见的,按他自己的话说:“在现存的考古学家中,没有哪一位在发掘一座遗址时能花费像我发掘坦叉始罗时所花费的那样长的时间”,他之所以将

21年时间主要献给了坦叉始罗遗址，是因为坦叉始罗是希腊化最深的城市之一，这里的所有遗物（建筑、雕刻、工艺、钱币等）都受有古典风格的影响，包括大量的犍陀罗佛教艺术品，而他本人的老本行，也是最喜爱的专业，是古希腊、罗马研究。

马歇儿关于坦叉始罗的发掘情况，最初是以《坦叉始罗指南》（A Guide to Taxila）小册子公布于众的，这本小册子共再版了四次。1951年，马歇儿的巨著《坦叉始罗——1913至1934年间奉印度政府之命在坦叉始罗从事考古发掘的附图报告》（Taxila: 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Carried out at Taxila under the Order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between the Years 1913 and 1934）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巨著共分三卷，第一卷：建筑遗存；第二卷：小文物；第三卷：图版，该书扉页题辞为：“献给我所有在坦叉始罗的同事们，为了重新找到埋藏在地下的古代宝藏，他们跟随我辛勤工作了二十多年”。

马歇儿退休回英国后，潜心研究他在坦叉始罗诸遗址发掘出来的犍陀罗佛教艺术品，研究成果便是这部《犍陀罗佛教艺术》。这部著作篇幅虽不大，但却凝聚着作者大半生的心血，它是作者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最后一部著作。

1958年马歇儿临去世前，剑桥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这部著作，但马歇儿还未来得及看校样便与世长辞。最后，出版社请巴基斯坦考古局前局长古烈尔（M. Raoul Curiel）和范·洛辉赞教授（Prof. J. E. van Lohuizen）通读校样并于1960年将这部著作付印发行。

### 主要参考文献

1. Sir John Marshall: Taxila: An Illustrated Account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Carried out

- at Taxila under the Orders of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between the years 1913 and 1934, 3 vo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2. Sir John Marshall; A Guide to Taxila, Fourth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or the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in Pakistan, 1960.
  3. Amar Nath Khanna; Archaeology of India, Clarion Books, New Delhi, 1981.
  4. Jeannette Mirsky; Sir Aurel Stein; Archaeological Explor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5. Albert Grunwedel and Jas; Burgess; Buddhist Art in India, Susil Gupta, Second Edition, 1965.

**补记:**

本书初译于1982年秋,由业师齐陈骏教授指导。此后几年间,齐陈骏教授多次修改、审校书稿,并为书稿的出版多方全力联系,我在此深表感谢!

兰州大学历史系马明达教授、甘肃教育出版社徐明珏主任都为本书提出过许多宝贵意见,一并致谢!

自今年4月起,我受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室派遣赴伦敦大英图书馆与大英博物院从事研究工作,无暇协助校对。又为了方便中译本排版,行前仓猝地将原著图版、目录及说明部分略作调整或删除。因此有可能产生的一切谬误由我个人负责。

王冀青

1989年6月20日于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SOAS)图书馆

## 作者自序

阿尔弗莱·福色尔先生在撰写《犍陀罗希腊式佛教美术》一书时，尚不具备一个重要的条件：当时几乎没有可以帮助他重建这一艺术流派历史的外来证据，尽管他的推测能力极强，但有时也会猜测离了谱。例如他将马尔丹地方盖兹麦斯的著名佛像之年代定在公元前1世纪，这较其实际年代要早二百年。自福色尔先生的杰作问世以来，我在但叉始罗已多次进行过考古发掘，所获美术遗物甚多，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排比年代顺序时资料的匮乏。这些考古发现使得我们对犍陀罗艺术史有了新的认识，其中最主要者有以下几点：

第一，考古发现证明，在犍陀罗曾经存在过两个截然不同的艺术流派，其中较早的一派兴盛于公元1至2世纪，较晚的一派兴盛于4世纪后半叶和5世纪。考古实物还揭示了两个流派在各方面存在着的显著差异，不仅它们的艺术特点大不相同，而且使用的材料也不一样，较早的一派使用石料，较晚的一派则使用的是灰泥。本书仅涉及其中较早的一派，即前期犍陀罗派。

第二，我的发现表明，现知最早的佛教雕刻品属于塞种（塞西安）时代后期，此时犍陀罗地区的古典希腊式艺术已经降到了极低劣的水平，尽管来自沿海地区的早期印度派雕刻家们还雕制出了一些较好的作品。

第三，爱好希腊文化的帕提亚人（安息人）继塞种人之后，于公元1世纪进入西北边境地区，在他们的统治下，曾发生过一次强大的希腊艺术复兴运动。这种安息—希腊式艺术在后来的犍



陀罗艺术演变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四，贵霜人（大月氏人）在公元64年顷逐走了帕提亚人，开始了对西北边境地区的统治。其间犍陀罗艺术渡过了它的发育期和成熟期。至韦苏提婆一世在位时，犍陀罗艺术突然衰亡，当时整个西北边境地区的佛教寺院都遍遭蹂躏，化为废墟。

第五，我还摸清楚了一条线索：在犍陀罗派的历史上，不同时期使用着不同种类的石料，因此，雕刻所用石料的种类可以大大地帮助我们确定雕刻品所属的时期。

把握住了这几点之后，犍陀罗艺术演变的历史便解析成为三个主要阶段：塞种时代为其幼年期，安息时代为其童年期和发育期早期，贵霜时代为其发育期晚期和成熟期。一旦在这些外来证据之上进一步增加雕刻品本身的内在证据时，这些雕刻品的前后顺序以及它们逐次的风格变化特点就顿时显而易见了。

以上是犍陀罗艺术史的大致轮廓，在下面各章我将全面铺开详述。我确信，这部艺术史将会为世人所承认。在此，让我声明一下，我这本小书最多只能起到“但开风气”的作用。对于犍陀罗艺术史的重建，我已经铺下了基础，我也相信这基础确实已被铺下。但是在整个“建筑物”完工之前，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比如，雕刻作品所使用的石料需要更有系统地检查，鉴定其种类，采石场的位置也得确定下来；接着还需要将每一时期所流行的建筑物装饰设计、装饰图案以及各个时代的雕像上反映出来的神、人装束打扮式样考查清楚。然而，要完成这些工作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要将各博物馆藏的雕刻作品重新分类编目，而且还要为研究者提供大量的照片资料。

至于本书对犍陀罗艺术史的分期，应该注意（我想要强调这一点），所划分的几大阶段之间的界限，不能被视做是一刀切那样整齐。演变的过程是有持续性的，有许多雕刻作品，它们在两大阶段之间骑墙，将之归于这一阶段固然有理，将之归于那一阶